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儒家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经济生活也不例外。本文试就其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加以探讨。

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 中国经济主体的被动性

国民经济主体应该说是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自身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成了人之外而又主宰人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屑一顾、不知天命。孔子说，富裕如果是可以追求的，那么为人赶车他也不在乎；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我行我素，任其自然吧。言外之意，富贵在天，并非人为。

儒家这种经济主体天命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埋没了。到处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人贫困不堪而内心并不骚动，贫于财富而富于情感，生活清寒却对赚钱之事冷漠。

经济主体天命观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社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里，即便赋役和地租剥削率不变，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也会波动很大。岁美则穰，生活相对宽松；岁凶则恶，生活极端拮据。“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一个人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或工商业，很难成为富翁，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等）却能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有规律性，人们觉得好象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和极少数权贵，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生杀予夺全在统治者，区区贫富算得什么？因此，国民经济天命观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残酷的专制政治合成的产物。

二、“存天理，灭人欲”
——中国经济动力的绝弃

禁欲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虽不是一种宗教，但却近于宗教，这已是哲学和宗教界所共同承认了的。

佛教、伊斯兰教都提倡禁欲，但这里只用新教的禁欲主义同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进行比较。

新教禁欲并不否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圣经》有关经文甚多。如“财富保护富人”；“勤劳致富”；“收获季节大睡特睡的家伙不光彩”；“穷人挣扎生活，富人享受生活”等等。新教的禁欲仅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珍重、爱吝和追求，其结果为资本的不断积累。

儒家的禁欲则不同。首先它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发财致富欲在舆论上持否定态度；其次儒家的禁欲并不表现为对现有财富的爱惜，结果并不促进资本积累，因为节余下来的财物总会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花掉。因此儒家的禁欲，实质上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里，没有比存在于社会成员心中的原始的强烈致富欲更巨大。恩格斯讲过，卑鄙的贪欲是私有制社会的动力，追求个人财富是私有制社会唯一的具有决定性质意义的目标。而儒家文化却要消灭它，岂不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新教既宣扬为了上帝而节俭,又宣扬为了上帝而致富,把禁欲等同于反消费,如此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都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上肯定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与此相反，儒家的禁欲却表现为知足知止、安贫乐命，远离经济生活，而不注重为积累而节约。该禁的欲没有禁，不该禁的欲却特别认真。因此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步。孔子说，放乎利而行，多怨。孔子对于人的利欲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政府对于经济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和压抑的，人们对经济生活缺乏热诚，整个经济气氛沉闷。

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中国经济效益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注重经济效益。既没有投入产出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概念，纯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计算过农业劳动耗费量，怀疑过家庭手

工业的合理性，认识到自然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研究过经济核算问题，为追求生产力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催促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瘠薄。

然而另一方面，非难功利的说教却不厌其烦，讲得头头是道，义正辞严。它宣称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儒化官吏无不讳言财利,从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一心只想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封建道义（亦即所谓“天理”）摆布天下。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毒害。

修铁路、建工厂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代替人力畜力运输、家庭手工业本无什么惋惜可言。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为此等问题争论不休呢！反对派指责，这些近代生产力象征严重伤风败俗，破坏风水，有碍男女之大防，使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破产，瓦解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明知新的生产力那巨大的效益，却因为担心封建道义的破坏而没有不坚决反对的，以至于花钱买下外国人修的铁路而拆掉，捣毁近代民族实业家惨淡经营的企业……，你说，多么荒唐啊！

明清以来实行愚不可及的海禁政策也是一例。许多进步人士反复劝告朝廷开放国门既可以增加关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又能保证沿海人民的生计。可是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就是充耳不闻，他们害怕中外接触，会动摇封建道德体系，宁愿让沿海人民生计窘迫，贫困不堪，也决不对外开放。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打开国门，但中外接触仍有许多限制。要是外国人愿意的话，反动政府还想关门大吉呢！

类似例子还很多，象所谓“奇技淫巧”当禁、货币流通

当限、祭祀凭吊当铺张等等。它“遵循”伦理却忽视经济规律，只顾一时经济平衡，往往牺牲经济增长。其消极影响十分严重。

四、“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
—— 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

稍具中国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战国时候，就已广泛采用牛耕铁犁，而时至当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要象征仍然是铁犁牛耕。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文化为什么如此滞留不前？

假若我们将中国的其他农业生产力象征、手工业产品数量和质量、商业组织形式、货币流通理论和制度、交通状况、都市建筑等，同西方同期相比，我们会发现，历史愈是接近近现代，我们愈是惭愧。

中国是最早采用纸币制度的国家，可是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二千年前就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都市，可是在统一的帝国政治下，城市始终软弱，没有独立的意义；长期以来只有伦理和礼仪规范，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尤其是商法之类，缺乏近代资本主义投资所要求的理性的法律程序，以世袭制、宗法和政府首脑兼任这一切。在儒家那里，物质福利不是诱惑的源泉而仅仅是彰扬道德的重要手段。先秦诸子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后世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学东渐时，仍有人在津津有味地咀嚼而丝毫不觉陈腐……

这究竟是为什么？儒家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儒学告诫中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这种观念指导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作官、食禄这条路。“学”的是仁义礼智、治国安邦之术；“官”的是正义明道、吟诗作赋之事。对于那些名落孙山的不幸儒生来说，如果不想作小人的话，也不会投入经济生活中去的。正象马克斯·韦伯所说，儒学培养出一批高级书呆子，除了哲学、文学，其它知识极少，尤其是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相反，清教徒则受到《圣经》中如法律知识和经营管理思想的教导，他们把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合理控制自己的手段，而把哲学看成是浪费光阴的把戏。①

儒士的智慧没有注入经济生活中去，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就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创造过优美的文学和独立而深刻的哲学，却让经济文化长期停滞落后，为什么中国人贫于财物而富于情感。

五、“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中国消费的特殊性

宗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地起阻碍作用。教义不同，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不同。新教伦理已为马克斯·韦伯证明为资本主义精神源泉。根据他的分析，新教中的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使自己服从于这笔财产，他必须厉行节俭，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同时必须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增殖财富。这样新教就以上帝的意志向人们宣布了两件神圣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职责，一是赚钱，二是节约。人生的总目标无非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争做上帝的选民而积累财富，显然这对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作用巨大。与新教伦理相比，儒家文化不仅对财富保值和增殖缺乏责任感，而且提倡轻视和浪费财富。儒家在提倡崇俭的同时，对某些特殊的消费项目不仅未加限制，反而为之辩护、鼓励。这些项目包括宗教迷信开支和家庭外交开支等。儒学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因此儒学中的节俭不过是为了往后某一项浪费。因此许多人平时节俭，而始终又处于贫困之中。为了娶媳妇、建房子、奉老归山或者为了某一件根本不值得大肆庆祝的事情而耗尽积蓄家产。“破家尽业，以充死棺”，[①]“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死以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②]节俭与浪费并存，省约与铺张相随，使资本积累无以形成，“贫穷、节俭、浪费、贫穷”的恶性循环难以摆脱。

六、“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中国人的贫穷神话

一间简陋的房子，就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无论房主是君子、小人。这是明显的道理。其他享受也是一样。

然而儒学并不这样认为。它说有教养的人住在里面，就不觉得简陋，其好处不亚于巍巍宫阙。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以孔子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中心思想编造的一套君子居陋室美不胜言的神话。类似逻辑，在中国古籍中到

① 《论衡·薄葬》
② 《潜夫论》中《务本》、《浮侈》两篇。

处可见，并且扩展到吃、穿、行、用诸方面。他们坚信物质生活的贫困不算什么,只要自认为是‘君子”,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孔子称赞颜回‘贤”,说他生活极端清苦而不改其乐。一切只要自认为是‘君子”,而不是‘饮食之徒”‘盗跖之徒”的人，都应该安于目前的贫困，一心扑在自我修养上。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义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后者认为贫穷是耻辱，穷人给上帝脸上抹黑，富有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儒家这种观念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在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里，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必须给大众包括那些穷书生以不损体面的安慰，给在贫富斗争中失败的人以安慰。

第二，儒家注重消费的实用性。强烈的实用观念使它敢于蔑视财富价值上的优越感，让人觉得那些“富而骄”的家伙愚昧、可笑。

第三,儒家文化推崇内省,突出心理享受和精神愉悦,强调自我感觉和从学问道德方面用功，因此贫困的处境并不会引起内心的骚动，人们相信儒学教义并且能够实行。

本文原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一九九二年第 3 期

中国传统经济思维弊病

一 、 教 条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普天恪守古代圣贤‘不殖货利’的教条下，由于现实经济问题所迫而勉强产生的。西汉哀帝时，师丹呈限田方案，谓“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① 孔子很少谈‘利”，孟子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直到中国近代，还有人反复奏请朝廷‘戒言利”，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缺乏预见和理论体系，是一种权宜之策，穷于应付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经济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平时不注意也不愿意主动研究经济 “士尚拘虚。穷年矻矻，比迹书鱼”，②“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从而高之”，③ 一旦遇到经济问题，这个极不平坦的抽象思维猎场，除了从线装书上找寻陈法故策外，再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④“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⑤ 贞观二年，王对太宗说：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
③ 《潜夫许·务本》。
④ 《潜夫许·讚学》。
⑤ 《文子·上义》。

“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① 这种教条主义做法，使中国经济思想进步如此艰难，以至于象门罗所说，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会使人受到“折磨”，“因为它对智力进步的困难提供了那样充分的证明”。②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复严重、片面零散、肤浅实用等特点，或多或少与教条主义有关。

二、封闭

中国的地理环境、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以及专制政体，共同造就中国社会的闭塞状态。中国长时期相对于周边“夷狄”政治经济的优势，礼乐文明的发达，……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培养了中国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势，具有罕见的顽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机制，然而，它严重缺乏一种在西方经济学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经济观念向近代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变，结果它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思想大致分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洋的，这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自然是纯中国的。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

① 《贞观政要·政体》。
② （美）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序》。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大冲击？它那独一无二的经济术语，那武断、片面的经济逻辑思维，得出多个激进、荒谬的政策主张。而西方经济思想，即使是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是西方所有国家人类精神童年偶象；托马斯·阿奎那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似乎是超时空的，那种相互影响、汲取是多么不易辨认。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多么封闭。当它遇到涉外问题，是多么窘迫难堪。即便中国第一部货币专著的作者，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常识性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无知、愚昧、可笑。这种封闭性流毒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把以后中国人全变成西方经济学学生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谈到世界货币问题时，还茫然胡诌。

当近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为《国富论》的经济术语汉译而搜索枯肠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真正危机开始了。以后不能不求诸白话文，不能不从东洋译著中移植，不能不创造新名词。传统经济思想伴随那个传统时代悄然逝去了。它遭受世界传统经济思想中最惨的结局。到现在，只有少数人把它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去研究，现代经济学家再也顾不到它了，它被彻底遗忘了，失去思想最需珍贵的东西——继承。它的湮没是那样无声无息，好象不会存在。它的悲剧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三、道德至上

西洋经济思想，在资产阶级当政以前，在重商学派、古典学派占据经济思想领域以前，充满了神学的怪诞，闪耀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刺目的宗教色彩。以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为代表,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如价格、高利贷资本等，总是引经据典，将《旧约》之类的基督教圣典作为预制真理加以引用。所以，西洋经济思想是宗教经 济思想，相应地，在“道德哲学家”孔子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仿佛两千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象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① 在此之前，可想而知了。

①《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四、模糊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模糊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指什么，包括什么。古代思想家不给予它定义，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这些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伸缩性。不是概念更新以适应涌现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纳入旧概念。例如，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末”，把投资纳入“奢”，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奇巧淫技”，然后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尚朴”等教条，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维持落后的小生产经营方式。这些模糊性很大的经济概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如兴利除弊、子母相权等，乍看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对的。但正是在这些口号下，却隐藏着许多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它把众多不能包容的需要进一步揭示的方面包容下来，它使每一个本该进一步分解的概念不便分解，有人把这种现象叫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不可离析性或板块性①。这些模糊的经济术语所构成的经济思想，也必然是模糊的，更糟糕的是，依据模糊经济思想制定经济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意会性，从而为中、下级行政官员曲解政策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模糊性特点，包括的另一方面是论证

①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

过程的模糊性。从立论到结论，撇开中间胡乱的推理，我们简直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尤其是观念偏激的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逐渐偷换概念的办法把立论与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块。它的基本格式是“如此…则……则…如此”仿佛治理国家就只要按他所开列的只有一味药的药方就够了。一般来说，论证过程的模糊性，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概念在逐渐转换过程中逐渐扩大，舍弃其他原因影响，如正名、抑末等主张；一是概念在逐渐转换过程中逐渐缩少，舍弃其他可能结果，如汪士铎的国穷由于人多，人多由于女多，所以应该溺杀女婴。明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这一特点，可以打消我们企图寻找中国经济思想精确答案以及设法理顺古代人的思路的愿望，也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日趋精确的现代经济学著作中为什么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简论

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是 80年代出现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本文要告诉读者的，是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的概况。

一、人性：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在中国古代，对人的本质问题、人性问题，一直争议不休。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的“热门话题”。较有权威的见解，是人性善和人性恶两种。

认为人性善者，断言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他们又说，学问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以后变坏了，应归咎于后天失教。后天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培养仁义道德。其核心为“仁”。“仁”，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爱人、关心人。由此形成下述经济思想：

（1）发展生产，保证人们生活需要。主要措施有：“不失农时”，确保农业生态平衡，兴修水利，保证耕者有其田，推广铁农具及其农业生产技术，“勤百工”等。

（2）搞活流通，促进商品交换。主要措施有：“关市讥而不征”，反对国营工商业“与民争利”，提倡高度自由经济政策。

（3）薄税敛，减轻人民赋税负担。提倡“至平”、“至公”、“有常”财政原则。赞赏财政转移支出和赈济行为，缩

小贫富差距，抨击财政搜刮。

（4）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攻击消费分化状态，严厉指责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奢侈淫逸，置他人饥寒于不顾，等等。

很明显，上述经济思想都是从“人性善”出发的，它的中心思想是爱人。这种类型的经济思想，这种思考方法，是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的主流。以儒家为代表。

认为人性恶者，断言人之初，性本恶；治国平天下，不可讲究仁慈，必须用严酷的法律和残忍的政治手腕来统治人们。

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是自私的，那么，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从此出发。具体讲：

（1）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过程中，必然发生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法律和行政手段。

（2）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国家要想正确而有效地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不能实施自由经济政策。相反，必须采用垄断经济政策。利用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实现国家经济目标。例如，国家要增加粮食，首先要确保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要严厉打击工商业等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以充军、作奴、没收财产相胁迫，辅以消费上种种限制、政治上歧视、舆论上谴责等等。其次国家垄断粮食经营，控制粮价，使工商业者无利可图。最后，国家给那些生产粮食多的人以官衔或者“复其身”。

（3）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国家就大可不必实施赈济，也不必“足民”，不必“藏富于民”。作为统治者，

只需考虑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无需为民着想。

很明显，上述经济思想，都是从“人性恶”出发的。它的中心思想是“自私”，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的实践。它以法家人物为代表。

二、道德：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

整个古代世界，道德都没有失去其作为经济行为价值标准的意义。我们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残篇遗著中，在《圣经·所罗门格言》中，都可以大量地看到这方面论述。但是只有在古代中国，道德是经济行为的唯一的价值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经济哲学，是道德经济哲学。西方经济行为价值标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当今世界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主要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虽包括道德，却不象古代中国人把道德视作经济行为唯一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具体讲，可以从以下方面去理解：

(一)经济问题的道德原因。当今我们研究经济问题,多从经济体制本身及其相关的政治体制着手，很少有人从道德的角度立论。然而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被认为与社会道德风气和个人道德修养有关。例如，长达几千年的农村土地兼并问题，不被认为是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以及封建特权的必然结果，而总被认为是人心不足，世风不正造成的。商人贱买贵卖，囤积居奇，不被认为是获取让渡利润的必要途径,而总被认为是商人道德品质恶劣的缘故。消费上的僭越现象，不被认为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实权扩张的表现，而总被认为是礼 崩乐坏所致。财政搜刮、货币发行量过多……所有的经济问题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是道德败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